

理论与现实:近代中国学界论亚当·斯密与李斯特

张登德,刘倩

(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济南 250014)

摘要: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盛行世界半个世纪之后,受到了主张贸易保护的李斯特的挑战。因两者所代表的学说皆能推动国家发展,故为世界不同国家争论和实践。二者学说自传入近代中国以来,学界开始探讨他们的关系,或论述二者存在的学术分歧,讨论对立性;或肯定二者的经济学地位,分析共同性;或者探讨二者所代表的经济学发展模式及呈现的道路选择。学界对二者关系的论述,一方面是基于理论视角与学理层面的探讨,另一方面立足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现实考量。

关键词:亚当·斯密;李斯特;自由主义;贸易保护;近代中国

中图分类号:F091.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1)01-0029-07

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著名经济思想家,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主要倡导自由贸易学说。李斯特(1789—1846),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主张保护贸易。两者的学说在英国和德国的发展中分别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两者所代表的学说皆有成功的经验,故而为世界不同国家所争论和实践。两者学说为中国所知则是19世纪中期之后。因受外国侵略,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成为近代中国的历史任务,在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过程中,斯密、李斯特的学说开始为近代学人所关注,尤其是民国时期,学界并列探讨两者的学术分歧、共同性、道路选择等。对于这一文化现象,目前学界尚无研究成果予以探讨。通过研究发现,近代学者对亚当·斯密与李斯特关系的分析,一方面是基于学理层面,出于译介和撰述经济学论著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立足近代中国经济情形而呈现的经济道路抉择的现实反馈,既具理论价值亦具现实意义。

一、两者进入学界的视野

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过程中,“外国的经济学说便被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看作救亡图存、振兴中国经济的不可或缺的理论工具”^[1]。近代经济学者“每谭世界经济竞争事,辄

为中国前途危,盖有志于输入学说以救时久矣”^{[2]1}。严复即说“晚近欧洲富强之效,识者皆归功于计学”^{[3]43}，“夫计学者,切而言之,则关于中国之贫富;远而论之,则系乎黄种之盛衰”^{[4]7}。梁启超在《〈史记·货殖列传〉今义》中谈到经济学在欧洲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西士讲富国学,倡论日益盛,持义日益精,皆合地球万国土地人民物产而以比例公理,盈虚消息之。彼族之富强,洵有由哉!”^{[5]35-36}他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谈到经济学说与国家存亡的关系,认为“兹学左右世界之力,将日益大,国之兴亡,种之存灭,胥视此焉”^{[6]5}。所以,自由主义、保护主义等西方经济学说,在传教士、留学生、学者等传播主体的共同作用下,进入近代学人视野并受到重视。

1856年,英国传教士慕威廉和蒋剑人编译《大英国志》,由上海墨海书馆出版。该书在介绍英国汉诺威王朝的“土人”时,提到“著书述国政商贾贸易事者,曰亚丹·斯密”,为晚清中文读物中最早出现斯密之名。此后,《富国策》《富国养民策》《佐治刍言》等译作中片段介绍斯密学说。1902年,严复译著《原富》出版后,国人得以系统获知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7]。同时,以保护贸易出名的德国经济学者李斯特,其提出的后进国家实行保护主义的崛起经验,亦引起近代中国学界的注意。中国留日学生在《译书汇编》上以

收稿日期:2020-09-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亚当·斯密学说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研究”(16BZS088)

作者简介:张登德(1973—),男,山东潍坊人,历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倩(1994—),女,山西晋中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理财学》为名连载李斯特的学说。学界开始分别译介和评述两者学说,后来在撰述经济史著作时,既谈及两者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影响等共同性,又分析两者在国家经济与世界经济、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生产力学说、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分歧;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学界讨论了这两种不同的经济学说以及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国家富强之道路,以求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之路提供学术与理论上的指导。

二、分析二者存在的学术分歧

在理论出发点上,斯密选择了自由放任发展经济理论,李斯特则主张以国家经济发展为前提实行保护主义,并提出对斯密学说的批评。二者的这种学术分歧,是近代中国学界阐述的重点。

1914年,东方法学会编撰的《经济学要览》书中论述了斯密和李斯特对物质交换的不同看法:“斯密等以人类为先天的交换,因谓交换者甚于人类之天性,交换者自古而存在”,而李斯特则表示,“自昔人类以自己之制物势如自己身体之一部分,割自己身体之一部分以与他人,为人类绝对所不喜,其后欲望发达,始觉非交换无以充足之乃徐徐有交换之事”^{[8]26}。这是学界较早注意到的分歧之点。之后,学界主要关注二者在国家经济与世界经济、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生产力学说、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分歧。

首先,二者关于国家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态度。郭心崧提到,“从学说上首足反对斯密氏之自由贸易论,为保护政策之有力辩护者,则为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者李斯特氏”,李斯特以为斯密经济学说“为世界经济学”,“只知有个人与世界,不知有国家”^[9]。刘秉麟在《李士特经济学说与传记》书中指出,李斯特批评斯密学说为“无限制之世界主义,国家观念,既在所不顾”,“对于国家之经济利益漠不关心”^{[10]68}。国家主义学派的领导人李璜,尤为支持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理论,认为“亚丹斯密与其自由学派所以有超国界的假设,因为他们以为人类自今以后便会集合成一个大团体,而战争便要会不存在了”,此种观点实忽略了介于个人与人类之间的国家,“这个历史造成功的东西简直为自由学派所忘怀了!”^[11]赵兰坪认为,李斯特的国家主义学说“为史密斯世界主义之反动”,指出“李士特以为史密斯一派,但知个人与世界,不知个人与世界之间,尚有国家”,斯密的

观察点“一从世界各国之经济状况,一从个人之经济状况,而不及一国之经济也”^{[12]164}。区克宣在其书中谈到李斯特对斯密的批评,表现在“李士特反对亚丹斯密以利己放任政策为基础的世界主义,提倡各国以国民生活为中心的经济思想,努力建设国民经济学。”^{[13]142}这些论述,目的在于介绍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说,以区分斯密的世界主义,唤起国民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经济民族意识。

其次,二者所持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的对立。蔡庆宪认为,李斯特学说的主要部分是关于国外贸易,其明显的目的是推翻亚丹斯密和其他继起者的自由贸易原理,“且含有指导国家如何能够推翻英国商业的优势的愿望”^{[14]67}。李权时指出:“斯密氏的自由主义之宰制欧洲大陆的经济思想几及一世纪之久,及至十九世纪中叶而反动逐起”,其主要表现是“德人李斯特之倡保护关税论或新重商论”^{[15]3}。黄曦峰对此持同样看法,认为“在德国最初翻起反对亚丹斯密的自由放任政策的旗帜,而高唱保护主义经济思想的学者,第一即是里士特”^{[16]397}。

第三,二者在生产力学说上的差异。区克宣提到“亚丹斯密只研究交换价值,并且只研究物质的财货的交换价值,以肉体的劳动为唯一的生产动力,这种价值说必须由价值之基础的一种生产力说来补充的”^[17],这一补充理论即为李斯特的学说。朱通九、金天锡指出,“李氏除攻击斯密司的世界主义外,又非难他极端的物质主义”,李氏认为斯密“否认官吏、教员,牧师,音乐家及女仆等是生产者,以为能增加交易价值的,才是生产者”^{[18]218}。蔡庆宪对李斯特观点中“生产财富的力,较财富本身不知重要得多少”这一看法表示认同,赞扬“李氏解释生产力和非物质资本的学说,实居最超越最成功的地位,他的学说可矫正斯密只看重交易而不讲究生产力的偏见”^{[14]68-69}。周伯棣谈到“李斯德之生产力说,是由批评正统学派领袖自由贸易论者斯密斯开始,认为斯密的经济学有两大错误,第一是主张绝对的自由贸易,第二是倾向极端的物质主义”^{[19]68},而且“斯密斯对于精神的要素大不重视”^{[19]69},由此陷入物质主义与个人主义。

第四,两者研究方法的不同。区克宣认为,李斯特的研究方法“在经济科学中他的地位尤为重要”,他“以严格的方式去从历史上观察经济”,

“超过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之抽象的和原子论的见解”^[20]。谢俊认为,斯密采用“演绎与归纳两法”,而李斯特“纯用归纳法”^[20]。

学界对二者学说分歧的论述,在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学》中文译本出版后,学理分析更具丰富性和多样性,但其基本以李斯特对斯密之批驳为论点展开,体现出近代学人对李斯特文本内容的刻意遵照。此时期也有学者就李斯特对斯密的批评提出质疑。臧启芳认为“李士特对于斯密之批评亦每有不当之处。关于国家与战争诸端斯密固未如李士特所言而绝对不问也”^{[21]433}。陈国光也对李氏给予斯密的批评提出异议,说“彼以为斯密对于国家与争端漠不关心,实则斯密并非如李氏所言之甚,而绝对不问。即对于一定之关税与事业奖金,亦不如他人之想象,纯采自由主义,坚决反对”^[22]。此种对文本内容之质疑,其分析亦具可参考性。

三、肯定二者的学术地位

埃里克·罗尔在《经济思想史》书中指出:“李斯特学说的性质并不是完全不同于英国古典主义的。诚然,在着重点上是有许多差别的,……不过要是适当考虑到经济环境的差别,李斯特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也颇与他们相似。”^{[23]226} 日本经济学家大河内一男说“李斯特是德国的亚当·斯密”^{[24]86}。可见,斯密与李斯特之学说具有相似之处。近代中国学者亦从这两方面讨论二者的关系。

1906年,重远在《外国贸易论》一文中提到:“亚当·斯密立自由贸易派世称旧经济学派之鼻祖,李斯德创保护贸易派为历史经济学派之先驱。二者真经济学史上二大人杰哉。”^[25] 民国时期,不少著作将二者视为经济学各派之“鼻祖”“先驱”“领袖”,以体现二者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刘秉麟将经济学成立后之经济学分为正宗派、历史学派、社会主义派,认为其中斯密是“经济学的始祖”,李斯特为“历史学派的首领”^{[26]43},同时指出斯密和李斯特学说,均为“当时经济学界最占势力者”,两者的著作“皆有声于时”^{[10]3}。周伯棣讲到经济学派中的正统派或古典派,“以亚当斯密为斯派之首领”,“国家主义派以李士特为首领”^{[19]26},两人“各有巨著,各有系统的学说,对于今日以及未来之经济学均给予以莫大的贡献”^{[19]8}。林光澂称“现在最占势力的”

的经济学派是个人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各有各的开山鼻祖”,其中斯密是个人主义的代表,李斯特是国家主义的代表^[27]。杨定宇认为,斯密和李斯特的学说虽然“各有醇疵,但在经济思想界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28]1} 学界对二者学术地位及其贡献的肯定,彰显出二者的影响力。

四、对二者学术共同处的阐述

有学者从不同视角论证二者之共通点。刘秉麟指出,斯密与李斯特的思想都是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完成的,均受到卢梭思想的影响。“李士特之国家主义与保护学说,亦非李士特一人之所创造者也,其所承接于前人者,亦由个人主义之并非创自亚当斯密一人也。”^{[10]30}“以卢梭之霹雳一声,全欧登时响动……十八世纪之经济思潮,完全受此说之支配,为之放大光明者也,证之亚当斯密如此,回而证之李士特亦何莫不然。”^{[10]31} 刘秉麟还表示,二者对于国家统一是经济发达的先决条件这一看法均表示认同,“国内统一,实为经济事业发达之先决条件,李士特夙持此说”,斯密“亦与李士特有同一之论调”^{[10]4}。

李权时在《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一书中提到斯密与李斯特学说的共同之处。其一,李斯特坚持保护贸易政策的首要原因,即“为欲巩固国防起见,不得不采行保护关税”,“此曾就是斯密亚当也承认的,因为他在原富论里是主张保护造船业的”^{[29]59}。至于实行保护政策的又一原因,李斯特“为欲图报复起见,不得不采行保护关税”,“此曾斯密亚当在原富论里亦认为正当的,因为外国课国货以高税率,本国自亦可课该国货以高税率以示报复也”^{[29]61-62}。其二,李斯特认为“国际生产力之合作,常为战争、政治策略,商业恐慌等事所破坏,故为一至不完全之合作。虽国际生产力之合作,亦有重大之意义,因其能联合世界各国而为一也;然自文明先进之各单独国家言之,实无如何之重要”。而斯密“于此亦承认之,曾谓一国内市场之重要远超于其外国市场”^{[29]92}。其三,两者在贸易最终目标方面的一致性。“李斯特的最后目标也是与自由贸易论者的最后目标一样的,就是世界和平与大同。”^{[29]68}

马寅初将西方经济思想分为以斯密为代表的“自由贸易论派”或“古典学派”和以李斯特为代表的“保护贸易论或国家主义派”,认为斯密与李斯特有四处共同之处。其一,斯密注重经济发展

中之个人主义,“李斯特虽主张保护贸易,着重国家经济,但仍不废私人企业之意”;其二,斯密认为“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应绝然分开”,李斯特“亦有此意,但以政府对于经济制度,可以稍加干涉”^[30];其三,两者皆讲求扩大财富之总额;其四,斯密主张自由贸易,而李斯特亦承认自由贸易之理论上的正确。基于以上四点,马寅初认为斯密和李斯特是“所谓殊途同归者”,两人“同是主张个人企业,同是承认自由贸易为经济上最高原则,顾斯密氏所着眼者,为世界之财富,而李氏所着眼者,为国家之财富。结果则均以繁荣世界,谋全人类之利益为目的。故其所取之途径不同,而目的则一”^[30]。

学界对二者共同点的分析,是近代学人基于经济学理论上的独立思考,其中亦体现出对国内现实的考虑。近代学人认为二者重要之共同点首先是以国家为中心的,二者的出发点都以国家利益为导向,这在学者的论述中均有提及;其次为二者对国家幼稚时期实行保护主义的认可,最后之落脚点即是迈向自由主义的目标,其实质都是强调建立以本国利益为中心的经济民族意识,进而再谈论适合本国的具体经济政策。

五、选择“斯密道路”还是“李斯特道路”

斯密与李斯特对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的看法,是近代中国学界争论的话题。其背后是“斯密道路”抑或“李斯特道路”的对比抉择,是“英国式经验”或者“德国式经验”的参考借鉴。

清末民初,不少学者已开始对比斯密学说与李斯特学说,权衡中国经济发展之道。1901年,中国留日学生翻译的《理财学》按语中谈到“泰西讲商学者”,分为斯密为代表的“主自由贸易之说”和李斯特为代表的“主保护贸易之说”两派,而“我中国出口税重,而进口税轻,损己利人,已不可为训,况进口之货,又漫无稽查,鸦片之入,即由于此。”所以,李斯特的“力倡保护贸易之说者,以德国当时之情形,与我国相仿佛也”^[31]。可见,留日学生是主张中国实行保护贸易的。1911年,京师法政学堂笔记中对二者学说进行了对比,指出“两种主义,各有短长”,“中国各种产业,现在俱极幼稚,论理宜用保护政策,以防外人之竞争,无如进口税率,因为条约所限,不能自由加减,虽欲施其保护而无由,殊可慨矣”^{[32]104-105}。陈家瓚认为,李斯特的保护主义理论“固吾国所急宜效

法者”,他坦言:“今日而言外国贸易,则自由贸易政策,既据优胜劣败之公理,为列国所不取,其不宜于我国,亦何待言。然即在保护贸易之中,其当专采商工业保护政策乎?抑径采农工商保护政策乎?此不可不一研究者也”^{[33]25}。这些主张与严复等经济自由主义者形成“对仗”之势,然在清末经济自由主义的大潮流中,并未引起多大重视。

20世纪20、30年代,随着李斯特保护贸易学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学界关于中国实行自由贸易还是保护贸易的争论亦随之扩大。刘秉麟将亚当·斯密、李斯特的学说介绍给国人,其目的在于“能省察今日世界之情形,与吾国特殊之地位,与何种学说之可以采用”^{[10]3}。针对国人对李斯特学说关注不够的状况,刘秉麟表示“二者之学说,终不以反对与欢迎之不同,而其效力有异”^{[10]6}。其所著《李士特经济学说与传记》一书则是提醒时人关注李斯特的经济理论。唐庆增虽然奉行个人主义经济学说,但也认为个人主义“偏重于抽象的交换理论,于一国工商业发展之程序,政治上之计划,人民之幸福,悉置不顾,此为最大诟病处”,而“实以国家主义与吾国最切也”^[34]。姚嘉椿对斯密的自由贸易政策与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政策做了对比,认为中国不宜于自由贸易,当行保护政策,但他指出,保护政策之范围“不可不失之太广,或失之太狭,保护之程度,不可失之过高,或失之过低,庶几本国产业,因保护而发达,因奖励而振兴,不仅中国幸甚,抑世界幸甚矣”^[35]。马寅初表示,中国“根本谈不到自由贸易”,斯密学说“实可置诸不论”,因当时中国为“外货倾销之场所,高筑关税壁垒,犹不足以抵制于万一,若再主张自由贸易,是自愿为外货之尾闾。而国内气息奄奄、脆弱不堪之工业,更将因此而促其夭亡”,“故在中国之不能言自由贸易,实无人敢置异议”^{[36]569}。马寅初赞同李斯特式道路,提出中国应该实行保护政策,“以卵翼本国方在萌芽之工业,以图挣脱帝国主义者之经济锁链”^{[36]570}。任树邨将斯密、李斯特理论与中国经济状况结合起来,认为斯密的自由主义“已成为历史上之陈物,不适于今日之中国”,而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或较适合于今日之中国”^[37]。可见,当时大多数学者是支持“李斯特道路”的。

当然,其中不乏反对与质疑之声,有学者虽赞成保护贸易政策,但是他们结合中国实际经济情形,认为中国应该先清除实行贸易政策的障碍,

方可谈自由与保护。李璜在 1925 年撰文介绍国家主义经济学时,阐述了斯密与李斯特经济学的学术分歧,在文章结尾谈到:“我们中国不是李斯特所谓的地处温带,人口众多,文化已发达,工业已萌芽的国家吗?我们如何不应该实行保护政策?我们之所以未能,实因我们的税关在外国人的手里。这样看来,我们不收回关税,而实行保护政策藉以提倡发展新生工业,我们实无自救的第二个办法。”^[11]周伦超认为斯密的自由贸易政策与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政策,“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之政策,有行之而奏效者,亦有行之而失败者,今若欲凭个人片面之观察,以判定其是非,良非贸易事。”就中国的经济情形,“外货流入,无法制止;利权外溢,无术挽回,使此项修约之束缚不能解除,则国内工业将永被压抑而不能发展矣。经济侵略,令人寒心!”他希望“有志青年努力奋起,达到解除不平等修约之目的,庶可以言吾国对外贸易之政策也”^[38]。李如椽撰写的《吾国关税自主后采自由贸易乎?抑采保护政策乎?》一文提到:“自由贸易者,正统对派经济学之祖亚当斯密之所倡也;保护政策,则为历史学派经济学之创造者李士特所持之说也”^[39],在中国实行保护政策,“不庸稍缓,已无疑义矣”,但是中国关税未能自主,必须“立即宣布废除或修改不平等条约实行自主,则保护政策终无实现之时,一即国家永无出头之日!”^[39]

有学者则认为中国对于斯密与李斯特的学说应该兼收并蓄。丘咸指出:“虽然多数论者好像都跟李士特的学说,以为中国工商业十分幼稚,想助他发展,而不受外国货物的压迫而失其存在,非实现保护关税的政策不可!但我以为未必然!”他以为“我们要分别轻重,而主张同时为自由及保护了”^[40]。文公直认为,“吾华外受列强之经济侵掠,内而变乱相寻,民生凋敝已极。所谓个人经济、国家经济与社会经济等等主张,皆可兼收并蓄而考较之;融会贯通,取长补短”^[41]。鲁深认为,英国奉行斯密的自由贸易政策成为世界强国,德国信仰李斯特的经济学说迅速崛起,“呜呼!我国经济状况,陷于此境?是亚当士虽所主张者,适用欤?抑李士特所主张者,适用欤?”在他看来,“我国经济状况,既然如前云之现象,是较英德两国从前之经济状况,尤为恐慌;故当兼取斯二者之长,以补救之”^[42]。

自 1940 年代后,由于抗战之因素,学界亦处

于动荡之中,学术研究实属不易。尽管如此,学界关于二者经济模式的讨论,实际上是回归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中考量,试图将学术层面的理论应用到实际,以解决现实层面的困境。但是,学界的努力,没有政治力量的扶持,再加上中国社会性质的种种不成熟因素,此种讨论,最终亦在热闹过后趋于平静。

六、结语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社会的政治和经济。”^{[43]663-664}近代学界关于斯密与李斯特的讨论,既有学术层面的争鸣,亦有基于现实的权衡考量,是对近代以来国家经济诉求的策应,其中夹杂着时代性的多重互动与阐释个体的复杂性回馈。近代以来的经济处境,“召唤”着多数学者为早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不断求索,西学东渐被赋予了不同的时代内涵,学界对二者学术关系的论述亦是如此,基源于国家经济困境,引入西方经济学说试图弥补国家存在的“漏洞”,同时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又别具风采。

学界的讨论主要集中于 20 世纪 20、30 年代,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国家再次将中国作为商品倾销的市场,国内之工商业再度面临“崩溃”之境,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之后的民族主义浪潮迅速席卷全国,而在列强国家内部,为修复伤痕累累的经济,已然实行一定程度的保护贸易。“英国长期以来奉行自由贸易的政策,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包括张伯伦的关税改革在内的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均未付诸实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迫于战争费用的压力,英国于 1915 年开始对某些奢侈进口货物征收 33.33% 的关税,标志着英国开始放弃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44]316}英国等一些奉行斯密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的动摇,无不引起对保护贸易与自由贸易的思考。又 1929 年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备受质疑,各国纷纷建立关税壁垒,实行保护贸易政策,自由还是保护的“交锋之战”弥漫整个学术界,近代学人亦是如此,对斯密与李斯特关系的讨论被推至学术前沿,呈现出时代性的特点。其次,学界讨论的深度与广度取决于二者学说的在华传播程度。斯密的著作早在 1902 年就已全貌展示予国人,而李斯特的书籍迟至 1927 年方才

出版,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界讨论既具分散性又兼集中性的特点,亦蕴含了派别学术交锋的意味。德国学术与英美学术在华的“邂逅”,对于留学英美的学者和留德学人,因其信仰不同,亦加剧了学术层面的争辩与论战。

“西学的接受,是中国人根据时局的变化和社会的需要所作的一种努力。值得注意的是,传播和吸收西学,包括翻译西方书籍在内,从一开始目的就很明确。这就是为了救国,为了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一个民族、国家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总是从本民族、国家的现实需要出发,有所分析和选择的。”^{[45]146-149} 学界关于二者学术关系的探讨,其最终落脚点依旧是中国道路的发展问题,面对积贫积弱的中国经济,为了救亡图存,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适合中国的是斯密的自由放任学说,还是李斯特的贸易保护学说。学人大多选择站在李斯特这边。然而,在实际执行中,由于特殊的国情,关税不能自主,国家政权不稳定等因素,理论层面的讨论最终只能化为一代学人的合理幻想。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学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必须要在对西方不同经济学说的引进与交锋中,再结合中国特殊国情,以及在相关政治力量的扶持下才能得以确定。

参考文献:

[1]张申,信瑶瑶.近代学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努力[N].文汇报,2020-01-17.

[2]马凌甫.国民经济学原论·序[M]//津村秀松.国民经济学原论.马凌甫,译.上海:群益书社,1920.

[3]托马斯·赫胥黎.天演论[M].严复,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4]亚当·斯密.原富[M].严复,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5]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

[6]梁启超.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

[7]张登德.亚当·斯密在晚清中国的境遇考察与分析[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

[8]东方法学会.经济学要览[M].上海:泰东图书局,1914.

[9]郭心崧.亚丹斯密之自由放任政策论[J].学艺,1923(7).

[10]刘秉麟.李士特经济学说与传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11]李璜.论说:述国家主义的经济学[J].醒狮,1925(29).

[12]赵兰坪.近代欧洲经济学说[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13]区克宣.近代经济思想史纲[M].上海:乐群书店,1929.

[14]蔡庆宪.经济思想小史[M].上海:大东书局,1929.

[15]李权时.经济学[M].上海:黎明书局,1931.

[16]黄曦峰.经济学史大纲[M].上海:开明书店,1933.

[17]区克宣.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溯源[J].现代学术,1931(2).

[18]朱通九,金天锡.近代经济思想史[M].上海:黎明书局,1932.

[19]周伯棣.经济浅说[M].上海:中华书局,1935.

[20]谢俊.李士特之生平及其学说[J].民钟季刊,1935(2).

[21]韩讷.经济思想史[M].臧启芳,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22]陈国光.李士特之经济思想[J].经济丛刊,1935(4).

[23]埃里克·罗尔.经济思想史[M].陆元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4]王俊凯.李斯特政治经济学思想与中国当代社会问题[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14.

[25]重远.外国贸易论[J].新民丛报,1906(22).

[26]刘秉麟.经济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27]林光澈.读书指导:“国家经济学”的内容和阅读方法(上):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主办读书竞进会选定大党组一书目之一[J].商务印书馆出版周刊,1935(128).

[28]杨定宇.近代经济思想之三大派别[M].南京:南京书店,1932.

[29]李权时.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M].上海:东南书店,1929.

[30]马寅初.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思想之两大派[J].银行周报,1934(46).

[31]李士德.理财学[J].译书汇编.1901(2).

[32]熊元楷,熊元襄.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33]金井延.社会经济学[M].陈家瓚,译.上海:群益学社,1913.

[34]唐庆增.论说:经济学中之国家主义[J].醒狮,1926(82).

[35]姚嘉椿.从保护贸易与自由贸易政策讨论中国今后应取之方针[J].中央大学商学院丛刊,1929(4).

[36]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M]//马寅初全集:第8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37]任树邨.李士特氏之生平及其经济学说[J].

1935(10).

[38]周伦超. 自由贸易说与保护贸易说之比较观(续)[J]. 京报副刊,1925(323).

[39]李如棣. 吾国关税自主后采自由贸易乎? 抑采保护政策乎?[J]. 台中半月刊,1928(1).

[40]丘咸. 论坛:我国关税政策之自由与保护[J]. 商学季刊. 1925(1).

[41]文公直. 泰西近代经济思想史[M]. 南京:三民书店,1929.

[42]鲁深. 读“原富”和“国家经济学”的偶感[J]. 商职月刊,1936(1).

[43]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M]//毛泽东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4]钱乘旦,陈晓律,等. 英国通史:第6卷[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45]龚书铎. 社会变革与文化趋向——中国近代文化研究[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Theory and Reality: Scholars' Discussion on Adam Smith and List in Modern China

ZHANG Dengde, LIU Qi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Smith's economic thought of liberalism had prevailed in the world for half a century, then it was challenged by List, who advocated trade protection. Because both theories can promote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y are debated and practiced by differen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Since their theories were introduced to modern China, scholars had begun to discuss their relationship, that is, academic differences (opposition), and status of economics (commonality). They had also started to explor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represented by both of them and China's road choice. Scholars'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is based on both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academic level, and the practical consider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h in modern China.

Key words: Adam Smith; List; liberalism; trade protection; modern China

(责任编辑 沂 溪)